

收糧糧食突擊運動總結

陳譚秋

收糧糧食突擊運動，在黨中央及二次全蘇大會正確決定之下，由於大多數幹部的艱苦努力和堅定的執行，中決決定與指示，由於廣大幹部的熱烈擁護，一個半月奮鬥的結果，已經獲得了很大的成績，大多數縣份一般的已能完成或快要完成，收集糧食在百分之六十以上，現款約佔百分之四十，相當解決了糧食問題的困難，相當保證了紅軍及後方機關的給養。

瑞金在二月底即已完成，封鎖線一萬元公債，收集糧食在百分之九十以上，甯化、洛口、長勝、西江、石城，都在三月初完成。收集糧食的數量，甯化、洛口、石城在百分之八十，長勝、西江百分之七十以上，而且甯化長勝石城公債都超過了原定數額，這些縣份能夠完成或超過而且收集谷子最多的原因，是在他們能夠堅定的執行中央的決定與指示，特別甯化首先完成的是下巫坊機關兩邊區，他們粉碎了「邊區留糧法校谷子」的機會主義，嚴厲鎮壓了反革命的破壞，打擊了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，尤其他們能夠在收集糧食突擊運動中聯系分田查田鬥爭，與整理赤少隊的工作，甯化赤少隊清鄉了部隊電子兵，大大提高了糧食的積極性，爭先恐後的買公債交谷子。甯化城市工人自動到四十里以外中沙買谷子交公債，長勝與國維縣的華東和積極幹部將先交納的公債現款收回，改交谷子，這些都表現了幹部的積極領導作用，與廣大華東擁護革命戰爭，擁護蘇維埃紅軍的熱忱。

然而糧食突擊的任務，至今還沒有全部完成，收集谷子的數量也未能達到預定的計劃，特別是革命戰爭的主要戰線的後方（如廣昌赤水），以及容易受人侵擾的邊縣（如寧都、高太縣等）表現了不可容許的落後，（這些縣未收集的公債都在五萬元以上，寧都土地稅竟達一萬數千兩未收）。我們提完糧食突擊運動不能如期全部完成的原因，主要在於我們領導上和執行上存在許多缺點和錯誤。

一、機關的採用了十二月與一月擴大紅軍的突擊方式，將最大多數的幹部編入突擊隊中，（這種方式只有在必不得已的情形之下，才能適用）結果大大削弱了以至停頓了各工作部門自身的工作，以致沒有能夠取得各個組織系統幹部的配合，甚至糧食突擊的機關——各級糧食部，不但沒有在糧食突擊運動中健全起來，相反的省縣各級糧食部長，都只把自己編入突擊隊，充當隊長隊員，糧食部就沒有工作了，將糧食部的領導作用完全取消，使糧食突擊運動失去了中心領導，中央糧食部對於各縣突擊隊負主要責任，在開始的時候中央糧食部即採取了這種「行動委員會」的方式來領導突擊運動，並且還認為同時不應有三個或兩個以上的突擊，要求集中一切力量進行糧食突擊，直到三月初才改過來，才開始注意各級糧食部的組織與工作，然而因為這種錯誤的影響，至今各級糧食部還沒有達到應有的健全，這是糧食突擊運動不能全部完成的主要原因。

二、為了保障前方部隊的給養，主要戰線的後方與各邊區應當是收集糧食最重要的區域，然而我們對於這一問題卻注意非常不夠，而且太過。在突擊運動的初期，在整個工作佈置上，沒有着重於彭澤、黃島、江永等縣的突擊，（到三月初才加注意），對等部縣縣長太的領導也比較薄弱，致使這些縣份的收集工作處於嚴重的狀態，至今還有大的數量沒有完成。相當影響了前方部隊的給養。

三、突擊隊的的工作方式大多數是直接到華東中去進行突擊，或者沿門勸募，不是經過當地組織，經過黨團，工會及地方政權，有計劃的動員，幫助和協助當地組織進行突擊運動，而是超過當地各組織或代替了當地組織，突擊隊沒有能夠開始當地幹部，相反的許多地方脫離了當地幹部，甚至有些突擊隊或特派員，（如土地部在寧都的工作團及劉秉烈劉明銳在勝利）形成與地方幹部對立的現象，這樣當然不能夠吸引和推動當地大批幹部來積極參加突擊工作。地方幹部是當地華東的領袖，他們與當地華東有最密切的聯繫，他們在華東中有極大的領導作用，任何想脫離當地幹部直接進行突擊的企圖，都必然要遭到失敗，這是歷次突擊運動中最可寶貴的教訓。

四、在糧食突擊運動中，糧食主義的具體表現，主要在谷價與收集谷子問題上面。一切認為華東無谷子不能交公債，認為華東谷子漲價，華東不願交谷子的機會主義觀點，必須給以無情的打擊，突擊運動開始的時候在勝利，在寧都，在長江，在甯化都發生過對於谷價的動搖，「華東沒有谷子不能交公債」的說法在許多地方發生過，這些機會主義的動搖，雖然一般的迅速的克服下去了，但個別地方，個別幹部還不能迅速轉彎，不能堅定執行中央的正確指示，甚至到幹部提出的特派員同志，自己也發生這種動搖。如鄧子恢同志在與國楊放主張以分田多少做標準，來規定收谷的成數，并同意與國用佈告來限制各區的收谷成數，改定收谷價為六元半，劉秉烈同志在勝利縣糧食部簽名要求中央政府收回公債，然後再來打擊這些幹部，認為「國維兩員負責人及突擊隊長和隊員都有過厚的機會主義觀點」，同時以黨辦主任代特反機會主義的思想鬥爭。（如甯化在突擊運動中，撤消工作的七十餘人，鄧子恢同志在楊放以執行

紀律來代替思想鬥爭）也是這次突擊運動中反機會主義鬥爭中一種嚴重錯誤，中央糧食部對下級的指示，也有過多於說服的偏向。說服對於下級幹部積極性的打擊，也有過多於說服。五、反革命與破壞在各縣不同程度上停中，是採取各種不同的方式，在糧食突擊運動中他們主要的破壞手段，是提高谷價，斷斷居奇，使我們增加收集糧食的困難，所以在糧食突擊運動一開始，各地谷價即很快的高漲起來，這明顯的表現了反革命的破壞作用，我們沒有抓緊這一具體事件，開展殘酷的階級鬥爭，嚴厲的鎮壓反革命的破壞，恰相反，我們有些過地方用了限制各價的辦法來抑市價，或者全面以國家的糧食平價出售來壓低市價，（都是鄧子恢同志的幻想）。然而與國限制谷價的結果，沒有一粒谷子上市，城市工人與貧民發生糧食的恐慌，國家糧食出賣的結果，只是減少國家的糧食，增加紅軍給養的困難。這些奇怪的辦法實際是幫助了富農奸商，便利了富農奸商的操縱，更增加我們收集糧食的困難。同時反食鬥爭在各地沒有大的開展，多半是採取賄賂或押迫的辦法，沒有開展成爲華東的鬥爭。

糧食問題在殘酷的國內戰爭中，在最後粉碎敵人五次「圍剿」的決戰中，仍舊嚴重的擺在我們面前，需要我們用最大的力量來全部完成收集運動，使紅軍給養得到完全的保障，因此我們今後的努力應當是：

一、繼續完成落後地方的收集運動。特別是邊區與主要戰線後方的地區，更要最緊要的收集起來。務要保證全部收谷子，各省糧食部必須派出得力的突擊隊到這些縣區去工作。

二、為了儲存糧食與需要糧食的地區得到好的調劑，運輸問題，成爲我們目前最緊迫的任務。必須加強各地運輸委員會的領導，聯繫華東赤少隊的突擊，動員赤少隊有組織的運輸糧食，同時苦力運輸工會要用最大的努力動員木船工人切實進行義務勞動，尤其是為了保障邊區糧食不受敵人襲擊的危險，更應隨時收集隨時運送到中心區域儲存。

三、土地稅和公債徵收已完成的縣地方，要進行嚴密的檢查工作，收清尾數，迅速交倉庫轉解。未完成的縣地方也要在收集中隨時注意檢查，檢查工作必須與反貪鬥爭密切的聯繫起來。

四、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級糧食部，負責領導組織糧食，運輸和檢查的工作，計劃糧食分配調劑問題。

五、整理糧食調劑局的工作，擴大和整理糧食合作社，進行收買總糧與有計劃的調劑華東糧食，這一工作，首先必須抓緊糧食比較缺乏的地方如兆徽、汀東、上杭、博生等縣。

六、繼續開展節省糧食的運動，如：一、運動開展到下列以及華東中去，並號召華東多種雜糧蔬菜以補充糧食的不足。

（二十六日）

中央審計委員會審查國家企業會計的初步結論

我們曾經分別召集中央印刷廠、造幣廠、郵政總局、貿易總局、糧食調劑總局等負責人來開會，（有些地方并派過突擊隊去工作）檢查其經濟收支狀況，所得情形如下：

中央印刷廠

該廠每月有七千元以上的營業收入，是一個大的印刷機關。但這廠不計生產計劃和完善的會計，還未有查對國家企業機關應有的作用。他們有支出預算，無收入預算。問他們過去幾個月錢花成本，成本費如何？他們可以答不知道。只知道收來的錢都用了，而且每月的開支，似乎還向國家領過錢，但沒經過會計機關。——廠長古遠來同志這樣說的。該廠印刷物的估價，是把原料、工資、管理費，及例假工費等算入，另加百分之十的純利。又據中央國民經濟部檢查，該廠印刷「紅中」一期，紙需油黑十二磅，而報帳為二十四磅半，排字只七工半而報帳為十二工，這是說印刷廠的利潤更多，（國民經濟部說這是浪費，其實并未有用到這多，不過向紅中報社却收了這麼個數目，顯然是增加了印刷廠的純利。）但這些利益都塞去了，他們也可以回答不知道。這裏面當然包含着很大的不備是浪費面是貪污。他們的帳簿極不完全，（現正在清查中），用錢沒有標準，如工人借款，有時竟達到七八百元。負責人不知整個生產情形及每個生產品的成本，因而不知道那些是浪費，那些人是多餘，所謂生產計劃，勞動紀律，節省運動，都提不出具體辦法來。

郵政總局

郵局自一九三三年建立了會計制度，一九三三年成立各級經濟審計委員會及節省運動委員會，并開始了反貪污浪費鬥爭，這不能不說是有相當的成績，但實際上據我們派去的突擊隊的報告，這一成績，只在當時某一種運動刺激之下，就奮發了一下子，未有在積極方面建立經常的工作，所以現在的審計和節省委員會都成了停頓狀態，同時發現了去年十二月決算存餘三百元，沒有轉入一月份的賬，而一月份的決算已做了，這筆錢就不知下落了。（現已責成他們限期清查出來）又三月份決算，我們以其未有遵照人民委員會節省三成就的指示原則，責令重做，而重做帳的仍然一樣，這由於該

負責人不知道各郵局實際情形，也沒有發動工作人員來共同討論，不知道怎樣節省，只好把上月決算照抄，把下級機關照轉，就了事。最嚴重的：二月份郵局工人節省和募捐達二千餘元，該局總務同志說，郵局工人自一九三三年以來，每月都有自動節省，平均在千元左右，那麼，一直到現在，這筆款當然很大，但總局只知道大概數字，就是工會收帳，有的存在省一級工會，有的存在本工會，有的解到全國總工會，而國家（中央財政部）并未有收到一個片。有一位郵委負責同志告訴我們說，時間已久，當時收帳人又未有簽回收條，連我們自己的多少錢也忘記了。工人熱烈幫助戰爭，而國家不能及時的實際收到此款，該局不去追回這筆下落，中央內務部也似乎不完全知道這回事，如果如此鉅款，竟被吞沒了，這是誰應負的責任？！

中央造幣廠

也有有支付的預算，沒有每月生產品的數字，對於國幣的銷費多少，合算不合算，廠長全然不曉。工資每月未有開支到預算的數字，原因是假的多，這也可見其勞動紀律的鬆懈。最近發現有三擔原料，九十五斤一擔，實際只七十斤，因為廠裏過去沒有檢查過原料和出品的比較，恐怕以前還有不少這樣的事。

糧食調劑總局

一月以前因貿易局長愛國調劑局長的原故，兩局帳目混起來，且二月以前未有決算，只知道糧食調劑局從開始到二月底盈餘一萬七千多元，在去年青黃交接時糧食調劑局比市價便宜百分之六十，分局百分之三十，起了相當的調劑作用，——於此可見有計劃的進行，其調劑作用，當更有可觀。而因為該局沒有建立，不能隨時隨地瞭解收支狀況，因此不能提出整個計劃，與分局的關係很鬆，勞動紀律也很差，竟有工作人員出賣半年，局裏負責人不知他是幹什麼的，等到他要回時，算了一筆很大的費用給他，也就完事了。

貿易總局

同樣也是二月以前的賬弄不清楚，每月盈餘的數字，約莫知道一些，比較完全不知盈虧的，可說是進了一步了。他們也未有能鉤有計劃的進行對外貿易，對各分局工作，也是不能了解。

上列諸廠局，一般的缺點是不明了本身在蘇維埃經濟上的性質和作用，不知道也不考察產品的成本，不知計算盈虧，有錢就用，沒錢向國家主管機關要。郵局雖不是生產機關，但他們的預算竟未列郵票一項的收入，如果僅看他的預算竟有出無入的機關。毫無疑問的，我們蘇維埃的國家企業是繁榮的發展的形勢，但國上說的缺點，還未能得到應有的進步，這是一。第二，各廠局都會經過檢查貪污浪費和反官僚主義運動，而因為沒有從鬥爭中去抓住各廠局的特殊性質與缺點，來從積極方面整理帳簿，建立會計制度，和管理法制，以致貪污浪費現象無從肅清，官僚主義的猖獗方式，未能徹底轉變，廠長局長不了解實際情形，提不出具體的辦法，反使節省運動和提高勞動紀律，變成空談。（如貿易局早就在「紅中」登載過要求政府停止津貼，但我們的突擊隊去進行深入的節省號召之後，才發現以前要求停止津貼之舉，是從上而下的決定，往後選舉手贊成過的人也就忘了，到了這時，才真正的從下而上的，成為事實的自願與自決的實現）同時上級機關，沒有經常的檢查和具體的指導，也應負相當的責任。此外還有兩種現象：一是工人同志積極性的提高，郵局工人經常的大量的節省，調劑局貿易局工人響應「紅中」號召，自動的完全不取工資，貿易局工人且每天減少一分半伙食，這是值得贊揚的。但各廠局長，則對於原料，生產，營業，辦公費的節省，尚待考慮，而對工人節省是有把握。這裏，恰恰與領導者的作風相反，這就是告訴我們，反對官僚主義的作風，把各廠局來澈底整理，我們倚靠着蘇維埃勞動熱忱，是不難得到應有成績的。

二是在大多數工人的革命競賽與衝鋒突擊來提高生產情勢底下，各廠局長一般的不僅不能領導這一勞動熱情，反而容忍不可避免的混進蘇維埃經濟機關來的害虫，以破壞勞動紀律，有些領導者認為工會的事，工人自己的事，似乎表示這是重視工人，重視無產階級的領導（？）這裏，又恰恰相反，這是向工人向無產階級領導機關玩笑。這就是告訴我們，要開天闢地最近「鬥爭」上發表的「從進步的勞動到自由的勞動」一篇文章，對於我們目前是有非常重要意義的。

（三月二十七日）